

# 第 1 章

## 新时代女性主义思潮

女性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采用现实主义标准，希望描写可以作为楷模的女性，塑造更丰富的女性形象，从而打破边界，涉足传统意义上男性独有的领域。在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要求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财产所有权和选举权。以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者要求“获得与启蒙运动赋予中产阶级男性相同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此外，“作为自己经历的完整主体和行为主体（agent），女性有权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Raphael, 2019: 27）。

女性主义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反对父权制是其最初的主张。在《无关紧要的妇女：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排斥问题》（*Inessential Woman: 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 1988）一书中，作者伊丽莎白·V. 斯佩尔曼（Elizabeth V. Spelman）指出：“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家没有认识到，否定人的差异和否定人的同一，这都同样有可能造成对人们的压迫。”（1988: 11，转引自童，2002: 318）女性主义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按发展阶段划分，女性主义流派可以分为争取选举权等的第一波女性主义、20 世纪 60—70 年代争取平权运动的第二波女性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三波女性主义，以及 21 世纪初英国女性主义者提出的第四波女性主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波”的隐喻遮蔽了有色人种女性（woman of color）、女同性恋（lesbian）、底层和工人阶级女性的努力，过度简化了女性主义的历史（Reger, 2012: 8）。

在争取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形成诸多分支和流派，其立场和诉求也不尽相同。女性主义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在线女性主义（online feminism）、无政府女性主义（anarcha-

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分离主义女性主义 (separatist feminism)、革命女性主义 (revolutionary feminism) 等。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 早期英国女性主义侧重于阶级与性别的关系; 美国女性主义偏重于实践, 关注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 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女性主义的哲学思辨意味更浓。

新时代女性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相伴而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neoliberal capitalism) 将女性拉入生产性创造之中, 使女性可以作为劳动力而与男性平等地存在。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 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人们相应地须警惕巨大的跨国公司以新的方式实施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ism) ——以隐蔽的方式, 借女性主义之名行文化殖民之实, 对当地文化造成冲击。与之对抗的是前殖民地女性主义 (ex-colonial feminism)、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思潮。这些非西方女性群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发展成为最近几十年女性主义浪潮中强有力的一個分支。此外, 族裔女性主义 (ethnic feminism) 也是女性主义思潮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从族裔视角来看, 美国族裔女性主义包括非洲裔、拉丁裔、亚裔、土著女性主义等, 其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

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采用一些已有的术语, “通过利用父权制产生的术语和观念再现父权制的一些设想” (Wojtaszek, 2019: 9)。这是因为在父权制体系中, 无论是哲学、社会, 还是政治制度, 都是以男性为主导发展起来的, 女性在这一体系中被置于劣等地位。“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所围绕的性差异形象源于占主导地位的、代表性的思想体系” (Wojtaszek, 2019: 9), 也就是说, 自学术女性主义 (academic feminism) 发展以来, 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倾向就是利用父权制的术语来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就难免会让女性主义理论受到父权制政治、社会等制度的影响, 包括其中的身体力量、语言、社会分工的划分方式等, 因此女性主义需要借助父权制的话语并通过批判来完成自己的独立。文学的标准由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确立, 并且由学术机构的书写得以树立和传播。“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早期, 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作品中, 批评标准与政治参与之间真实或明显的冲突不断以各种面貌复现。” (莫伊, 2017: 23) 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相互促进, 并行发展, 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也推动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谈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须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的大理论框架之下。

## 1.1 女性主义运动新发展

近年来，“女性主义已死”的呼声甚嚣尘上。当代女性主义的议题似乎被一些诸如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者（transgender）权利等问题所掩盖（Reger, 2012: 5），然而女性主义仍无处不在。正如女性主义作家詹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所说，“女性主义就像氟化物，溶于水中”（2000: 17，转引自 Reger, 2012: 5），女性主义的观点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乔·瑞格尔（Jo Reger）考察了美国女性运动的生命力和持续性，研究群体层面的行动，探索了“无处不在”的女性主义思想（2012: 5-6）。瑞格尔通过研究位于美国中西部、东海岸和西北部的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群体，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现状以及争取女性权利的方式。这三个群体在定义女性主义身份问题上，“主要采取注重文化的策略和战略，并与种族主义、包容性（inclusion）和性别流动性（gender fluidity）等问题做斗争”（Reger, 2012: 6），其多层次的活动因群体环境文化的改变而各异，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延续着女性主义运动。

瑞格尔在描述活跃于女性主义运动的不同群体时，倾向于使用“代际”（generation）一词，这让运动变成重叠的代际而不是由事件定义的波浪（Reger, 2012: 9），呈现为历史进程中女性运动的连续性和动态性。第一代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 generation of feminism）运动主要以正式组织为基础，女性主义活动者也通过“妇女教会团体、俱乐部、传教士组织、大学妇女校友会和职业妇女联盟等网络解决问题”（Giele, 1995: 2，转引自 Reger, 2012: 10）。1869年，这场运动在一些主张上出现分歧，形成了两个致力于女性选举权的组织——全国妇女普选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二者于1890年合并，持续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做出努力（Reger, 2012: 11）。至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由于家庭主妇的角色主导了美国文化，女性主义组织又陷入低迷。但是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多，受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到

了 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运动开始复兴，出现了第二代女性主义（the second-wave generation of feminism）。

第二代女性主义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一方面是诸如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妇女平等行动联盟（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和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等具有正式组织机构的女性权力组织分层次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一些集体主义组织（collectivist organizations）则致力于阻止等级结构的发展，让每个女性在群体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Reger, 2012: 12）。第二代女性主义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得以持续发展，但也因分歧和包容性的缺失而分裂。这段历史呈现了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义运动的起落以及几代人曾经面临的挑战和努力。

女性主义运动会随着时代的前行而相应地改变策略。多代人之间也存在着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问题，“运动参与者在其群体中相互作用，以确定内部和外部的边界，这个过程被称为‘边界框架构建’（boundary framing）”（Reger, 2012: 18）。运动参与者彼此互动，构建强大的集体身份，从而推动运动的持续发展。女性运动包含代际女性主义身份，她们在阐述群体和网络中的性别不平等观点时可以分为诸如自由主义（liberal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等不同派别，女性身份认同联系更加紧密。多元化问题也同样是美国女性运动的一部分，多元化问题有两种形式：有文献记载的排斥和偏见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录中对边缘群体的忽略（Reger, 2012: 20）。瑞格尔通过对女性运动历史的考察及其延续性、策略、身份和多元化的思考，指出当代女性主义在社会运动群体中延续，并且影响了女性主义身份的构建。

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还包括对某个特定类别女性群体的研究。例如，黛博拉·L·罗德（Deborah L. Rhode）对女性主义运动的研究起源于 1970 年她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境遇。她的研究回顾了大学中女性争取并逐渐获得更多权利的历史，通过调查等方式了解女性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以期增强女性面临问题的显现度，从而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1970 年是耶鲁大学开始招收女性本科生的第二年，当时女性被指责分散了男性的注意力，而那些专注学习或者在课堂表现自信的女性则被抨击为缺乏吸引力或女人味（Lever & Schwartz, 1971: 186–188，转引自 Rhode, 2014: 1）。女性往往被双重标准所束缚，常因太女性化

或不够女性化而受到批判。体育运动是摩擦的一个特殊来源，运动员和教练不愿与女性分享资源和空间（Rhode，2014：2），女性不得不为了参与运动项目而做出让步甚至受到歧视。她们因为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长期斗争，但是多年来，耶鲁大学的大部分课程仍旧是男性的专属，与女性相关的课程寥寥无几（Rhode，2014：3）。随之而来的30年里，女性的地位逐渐提高，但是她们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对于女性来说，其核心问题是缺乏共识，女性在社会上仍面临着更糟糕的境遇。为此，罗德从女性运动概述入手，通过调查就业问题来探讨工作和家庭问题，关注性、婚姻、生育、经济自主权、性骚扰、强奸、家庭暴力、人口贩卖、女性的身体外观、政治、变革策略等问题，聚焦社会平等、人身安全和经济生活等基本问题，旨在让女性意识到她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采取行动。

## 1.2 第四波女性主义 / 后女性主义

21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了第四波女性主义的概念。尽管一些学者对于用“波”的概念来划分女性主义各阶段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乐于使用“第四波”的概念，并将其与“情动”（affect）和“时间性”（temporality）的哲学概念结合，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拓展（Chamberlain，2017：1）。英国记者基拉·科克伦（Kira Cochrane）在2013年出版的《所有叛逆女性：第四波的兴起》（*All the Rebel Women: The Rise of the Fourth Wave*）中明确提出了“第四波”的概念，并给出了这一波思潮产生的原因。强奸文化（rape culture）、在线女性主义、幽默、间性（intersectionality）和包容性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强奸文化、在线女性主义等问题的关注与后女性主义探讨的焦点问题有交叉之处。

不同女性主义思想流派之间的主张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已然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女性主义流派的创新性与突破性。女性主义的概念凝聚了社会力量，并形成了强有力的运动，因而也被隐喻为“波浪式”的运动。但是，女性主义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和谐或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否可以与几代女性主义者整齐地保持一致”（Rivers，2017：2），或者仅仅以波浪的起伏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隐喻，这种看法

是否得当也值得探究。

女性主义内部一直存在分歧和批判,这也是其保持批判活力的来源。例如,在争取选举权的过程中,她们更多地表达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诉求,而忽略了种族和阶级因素所带来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这种女性内部的差异使当下关于女性主义的辩题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这种差异和多样性让女性主义内部充满活力,能够对外部压力做出迅速反应,从而“抵制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适性,以适应女性不断变化的经历和持续变化的政治格局”(Rivers, 2017: 3)。

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旨在提出一种“不以身份或代际为前提的波浪叙事(wave narrative)方法,专注于异常的能量,而不是区分”(Chamberlain, 2017: 10)。在英国,这一研究焦点的哲学背景是源于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于当代性的理解,其研究对象包括“新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阵地的建立”及“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立法”(Chamberlain, 2017: 11)。社交媒体的作用、经济政策等都影响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其背景是20世纪以来的经济危机和日益两极分化的性别讨论(Aune & Dean, 2015: 381, 转引自 Chamberlain, 2017: 11)。这一波女性主义被赋予阶段性的名字,其主要原因是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期待得到承认,并与其前辈切割,划清界限。事实上,黛比·斯托勒(Debbie Stoller)在鲍姆加德纳的访谈中提到,“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技术平台刚刚允许年轻女性主义者以新的方式传播相同的信息”(Baumgardner, 2011a: 72, 转引自 Chamberlain, 2017: 11),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些主张及第三波中被忽视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第四波中再次浮现。斯托勒认为,第四波浪潮尚未来临,因为女性主义并无突破性的创新。然而,普鲁登斯·钱伯伦(Prudence Chamberlain)则认为,尽管“浪潮”一词强调的是运动的强度,它同时也考虑任何政治运动都存在的内在连续性。第四波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异化的理解,其生成可以被看成女性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学者们试图在描述这一浪潮时,将其置于情感时间性(affective temporality)范围内,但描述“浪潮”是具有挑战性的,其中重要的内容是探究“当代的情感表述”(Chamberlain, 2017: 12)。

钱伯伦给出了第四波“情感时间性”的具体案例研究,探讨了“情感从个人向政治转移的方式,进而动员活动家们掀起连续和群体性的女



性主义浪潮”（Chamberlain, 2017: 13）。她强调波浪的汇聚力量——从个人情感体现为政治性的方式，再到体现为活动家的行动，并最终形成集体女性主义浪潮。这些案例可以揭示情感激增如何凝结成社会运动、如何以共同的诉求凝聚具有相似情感的人群。第四波女性主义中的情感时间性研究涉及形成状态（the state of becoming）的“私人 and 公众的情感、外亲性（extimacy）、亲密性（intimacy）”等因素，研究者要分析其“响应性（responsiveness）和偶然性（contingency）”（Chamberlain, 2017: 13）。在钱伯伦看来，这些生成中的情感都揭示了第四波女性主义中时间的独特性，并且造成了连续性的感觉。

除了女性主义理论外，钱伯伦还借鉴了希瑟·洛夫（Heather Love）和安·茨维特科维奇（Ann Cvetkovich）关于 ACT UP<sup>1</sup> 的观点，“思考激烈的艾滋病行动主义（AIDS activism）时期如何以某种方式映射到女性主义浪潮中”（Chamberlain, 2017: 14）。当下的女性主义着重对传统的两性划分、同性恋等标准进行解构，也就是针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和变性者（transsexual）来研究美国的抗议传统和发展，其结果呈现出不确定性和高度的跨学科融合特征。

第四波女性主义强调情感理解及女性主义运动的不确定性，其中需要定义的一个关键词是“情感环境”（affective environment）。在第四波女性主义的研究中，该词是指在线社交媒体中传播的关于女性遭受性别歧视（sexism）的经历，“这展现了在快速沟通和社交媒体发展的时代个人与政治的关系”（Chamberlain, 2017: 15）。第四波女性主义探究女性主义实践的情感环境，如荡妇游行发展历程中的符号解读，同时也思考日常性别歧视的档案记录特性，如“2012年建立的推特账户‘每日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以记录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厌女症（misogyny）”（Chamberlain, 2017: 15）。

钱伯伦认为，2013年迅速蔓延的脸书平台强奸运动（Facebook Rape Campaign）与资本的力量有关（Chamberlain, 2017: 15）。其表现形式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女性照片中，将家暴作为调侃的内容，并认为女性被强暴是其得偿所愿。一开始，这种针对女性的恶意言论被脸书纵容，但当女性团体借其购买力作为杠杆给脸书施压时，对抗性别歧视和

---

1 ACT UP: 全称为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这是 1987 年在美国成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护和治疗。

厌恶女性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终脸书在其广告商的压力下删除了这类内容。此种文化领域内的对抗体现了这一波女性主义中女性作为商品消费者的力量。

第四波女性主义中还存在语言标签问题，包括荡妇游行中建议使用的语言，以及脸书上反对强奸运动带来的后女性主义思考；也包括2015年的巴哈·穆斯塔法（Bahar Mustafa）被指控事件，她因为使用了“杀光白种男人”（killallwhitemen）标签而受到指控。钱伯伦认为，“第四波女性主义对白人女性主义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比对有色人种女性更安全的空间”（Chamberlain, 2017: 16），然而女性主义者的言论经常会被指责或者被断章取义地引用，并且被指控为偏执。

英国女性主义第四波浪潮避免仅仅将身份、实践或代际差异作为定义女性主义的手段（Chamberlain, 2017: 17）。既然特别提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另一次波峰，那我们就需要明确其与之前运动的显著差异，而且也需要考虑国家的差异，即英国和其他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北美国家的差异。英美女性主义都经历了三波浪潮，但是英国学者更专注于案例研究，并且在第四波女性主义中重点考虑“情感时间性”。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趋同的特征。

当下的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视野中表现为后女性主义及作为其延续形式的在线女性主义，其重要关注点是与社交媒体、在线媒介等流行文化相关的女性主义，其重要支撑点是技术发展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思潮依托网络平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是也遭遇了更汹涌的逆潮（backlash）。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女性的在线身份、遭遇的威胁、网络暴力及强奸话语的延续。

女性主义的历史存在复杂和周期性的特征。在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和克里斯蒂娜·沙夫（Christina Scharff）等女性主义者看来，后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有四个方向：作为女性主义内部的一种转变，表达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相关的认识论的断裂；女性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后女性主义的概念是对女性主义的逆潮；后女性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Rivers, 2017: 3-4）。第四波女性主义思潮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使其能够处理后女性主义话语的矛盾性、各个女性主义流派之间的冲突，以及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之间主题的纠缠。



虽然汉娜·雷塔莱克（Hanna Retallack）、杰西卡·林格罗塞（Jessica Ringrose）和艾米莉·劳伦斯（Emilie Lawrence）曾认为，随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尤其是基于社交媒体的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的兴起，后女性主义的主张现在可能是多余的，但罗莎琳德·吉尔认为，这一概念具有持续相关性（Rivers, 2017: 4）。当前，女性主义的许多表现形式——尤其是在主流媒体出版物中以专栏形式出现的内容——实际上“完全符合后女性主义”（Gill, 2016: 618, 转引自 Rivers, 2017: 4）。同样，后女性主义有助于分析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在解读中体现其内在的复杂性。第四波女性主义的到来可能标志着后女性主义的转变及二者的相互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后女性主义的消亡。我们处于新浪潮发展的当下，对后女性主义的理解以及对其表现形式的解读目前看来还不够充分。因此，当下的学者们仍然需要继续从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挖掘并发展其理论内涵与表征的解读。

当然，第四波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不仅是命名上的差异，二者在理论背景上也存在差异。第四波女性主义是基于英国的文化背景并具有一贯以运动表达诉求和以哲学为其理论支撑的特点。关于后女性主义的主张，斯蒂芬妮·哈尔泽斯基（Stephanie Harzewski）认为，“后女性主义所具有的多重而相互矛盾的含义反映出女性主义的发展超越了统一的政治议程，并分裂为相互竞争，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派别”（2011: 151, 转引自 Philips, 2014: 19）。这种后女性主义构想挑战所有认为两性具有稳定内涵的观点，并颠覆这种二元对立，辩称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类别。1999年的插图指南《介绍后女性主义》（*Introducing Postfeminism*）是最早出版的标题中包含“后女性主义”一词的书籍之一。指南开篇介绍道：“后女性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已经终结。”（Philips, 2014: 19）该书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后女性主义从对父权话语的解构中发展而来。这是女性主义的发展，借鉴了当代思想的关键分析策略——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Phoca & Wright, 1999: 3, 转引自 Philips, 2014: 20）

学术界认为，即使是在后女性主义阶段，女性主义运动仍需继续。但在大众的想象中，后女性主义意味着女性业已获得其想要的平等，“争取女性平等的斗争已然结束”（Philips, 2014: 20）。但是，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认为，后女性主义的进步主张已经被侵蚀和滥用，人们对女性主义的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盛行时期的那

些诉求和主张上（1991：95，转引自 Philips，2014：20）。当下的后女性主义由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发起，更多地传播女性主义与流行文化相互影响下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后女性主义是一种需要抵抗的文化现象，以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为其背景。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1996）代表了后女性主义的“乏味、消费主义和自我痴迷”（Philips，2014：20）的状态。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将后女性主义理解为对女性主义的“无情破坏”（Philips，2014：20），这是因为后女性主义对生活经验的强调并不能替代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政治和历史视角。因此可以说，虽然我们讨论的是女性主义的两个时期，但二者的主张在当下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如前所述，流行文化影响下的女性主义被定义为后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流行文化中蕴涵着媒体对社会化身体的作用，通常是通过图像（image）、叙述和观念对个体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流行文化元素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它表达了对大众的普遍适用性和影响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它通常是我们可以消费之物。”（Trier-Bieniek，2015：xiv）流行文化中关于酷儿（queer）形象的塑造以及关于有色人种、民族、阶级等的表述都让最新一波女性主义理论拥有令人瞩目的力量和持续性。

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倡采取女性主义立场来对抗父权制基础，将所有女性的声音置于前景，从而创造一种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她们从不同女性，尤其是被边缘化女性的角度或立场切入女性主义研究，从而强化女性主义观点。研究者自身的因素，包括职位、身份、女性的立场等对其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秉持这一主张的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强调情境因素，“要求将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置于相同的关键因果平面”（2004：36，转引自 Trier-Bieniek，2015：xxiii），挖掘方法和研究中的权力结构，同时也考虑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职位等身份因素，这样可以“了解女性的立场在哪里以及如何被忽视”（Trier-Bieniek，2015：xxiii）。

后女性主义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引入情境的因素。流行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和监控包括诸多现象，其研究范围可以涉及肚皮舞中体现的男性凝视（male gaze）、流行歌曲的歌词与女性主义潮流变化的关联性、流行文化中的黑人女性形象，以及流行歌曲天后（diva）的形象、美国